

中國全史大系 第九卷

中國秘史

光明日報出版社

中国全史大系

中国秘史

第三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胡惟庸奉旨探病 刘伯温死因不明

刘基，字伯温，明朝开国功臣，朱元璋把他比为辅佐刘邦成就帝王之业的张良，比为诸葛亮、王猛。当群雄角逐之秋，朱元璋对刘基的信任，简直如鱼之不可离水。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建立政权机构时，便任刘基为御史中丞。洪武元年(1368年)，朱又在《御宝诏书》和《御史中丞诰》中概括刘的功绩说：“从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则每匡治道，动则仰观乾象，察刘宿之经纬，验日月之休光，发踪指示，三军往无不克。”“方当兵起，乘时纷纭，……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以至谏狱审刑罚之中，议礼新国朝之制，运筹决胜，功实茂焉！”

但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却很快受到了冷遇，以致不久便被迫引退，后为又被“钦赐”还乡，最后当朱元璋派丞相胡惟庸探视了他的病况以后，很快就暴死于家，这是什么缘故？他的暴亡有什么蹊跷？

原来，朱元璋以淮人起兵淮西，立国以后，朝中的文武百官绝大部分都是淮人。丞相李善长、徐达，功臣汤和、耿君用、炳文父子、郭兴、郭英、周德兴、常遇春、陈仲亨、曹震等数十人，以及幕僚李梦庚、单安仁、郁新、郭景祥等，都是凤阳人。丞相李善长，是这个集团的中心人物。他们对其他地方的人取排斥态度。像浙江青田人刘基这样的功高硕学，而又刚正不阿，就尤其成了他们重点排挤打击的对象。朱元璋后来也多次对刘基的儿子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他只是有分晓的，他每(们)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明·刘璟《遇恩录》)。

要说刚直，那是刘基素来的品质，但却也常常由此遭忌。他在元末做江西高安县丞时，即以廉洁著名，“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小民自以为得慈父，而豪右数欲陷之。”他复检新昌州人命案时，毫无徇隐，初检官因此得罪被撤职，其家人众倚仗蒙古人势力，也“欲害公以复仇”。在担任江西行省大臣职官掾史时，“以谏直闻，后与幕官议事不合，遂投劾去”(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所以公私史家一致记载说，“基为人刚毅，慷慨有大节。每论天下事，是是非非，无少回曲”(《明太祖实录》卷99)。“至于义所不直，无少假借，虽亲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行状》)。

朱元璋平定张士诚以后，张昶企图乱政，派人上书颂功德，劝朱元璋及时行乐。朱把张的奏章拿给刘基看，刘基说：“他是想作赵高了。”朱点头。张昶知道后，怒形于色，便让齐翼岩等人伺察刘基的阴事，图谋陷害。但还未来得及动手，张昶却先因事



被诛。后来司天台遇灾，齐翼岩乘机上书攻击刘基，但奏中所谈的许多事，都是刘基平日已向朱秘密做了报告，或由朱直接指示刘基做的。齐不了解情况，结果书上，反被朱下令斩首，他的党羽及与张昶通谋的事，也被彻底查清。

张昶本是元朝的户部尚书，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航海出使朱元璋军中，朱见其才辨通敏，留为参知政事，根基并不很深。但是得罪了丞相李善长，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北巡汴梁，命李善长和刘基留守京师。刘基执法刚严，丞相府僚吏有犯律例的，一概不留情面。一个宦官监督工匠不严，刘基报告皇太子，置之于法。宿卫舍人在值班房下棋，也被严厉惩处。中书都事李彬贪赃枉法恰在这时被揭露出来，李彬一直依附李善长，窃弄威福，善长遂托刘基缓其刑狱。刘不答应，报告了朱元璋，请杀李彬。一天，正当李善长与众人商议祈神求雨时，接到了朱元璋批复的诛彬报告，善长大怒道：“今欲祷雨，可杀人乎？”刘寸步不让，说：“杀李彬，天必雨！”终于杀了李彬。及朱元璋还京，怨恨刘基的人纷纷在朱面前说刘的不是，善长也说刘基专恣。这时朱元璋因天旱求言，刘基奏道：“士卒死后，妻子全安置在别的营中，多至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尸骨暴露；张士诚将吏投降的，都被编为军户，足干和气。”朱元璋处理了这三个问题，可过了十多天，还是没下雨。于是朱对刘基非常恼怒。在周围这样紧张的气氛下，这年八月，刘基不得不借口妻子亡故，请求告归。

刘基的这一次致仕时间并不长。当年十一月，朱元璋在平定了扩廓帖木儿之后，即驰诏召刘回京“同盟勋册”。刘应诏回京后，朱给了他很厚的赏赐，追赠他的祖、父皆为永嘉郡公。

不久，朱元璋对丞相李善长有些厌倦，为物色丞相的事征询刘基的意见，刘基所答意见与朱元璋本意相左，朱所提之人，实际都是他心中考虑已久、早有属意的人物。刘基如此轻易地将他们一一否定掉，大忤朱意，也从此为自己埋下了危险。

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朱元璋在给刘基的《弘文馆学士诰》中说：“于戏！苍颜皓首之年，当抚儿女于家门。何方寸之过赤，眷恋不舍，与朕同游。后老甚而归，朕何时而忘也。”这是用极不客气的话讽刘基引退，显然这时朱元璋对刘基已深有厌弃之心。这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只封刘基为诚意伯，食禄只有二百四十石，而李善长则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朱元璋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中书左丞，同时赐刘基归老乡里。二月，刘基第二次回到青田。

可是，刘基在家也未能过得安稳。当初，刘基请求在浙闽之间一片名叫“淡洋”的空旷地带设立巡检司，这时恰有逃军在这里造反。刘基派长子刘璉入京向朱元璋报告，没有先同中书省打招呼。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大权，心中一直对刘基以前反对自己做丞相恨恨不已，此时遂乘机陷害。他指使刑部尚书吴云让老吏告别，说淡洋之地有王气，刘基想占作自己的墓地，百姓不给，他便请设巡检司，结果激成事变。这无异加给他一个谋篡的罪名。于是朱元璋将他的岁禄剥夺干净。从朱后来的《钦赐归老青田诏书》所说“何期祸生于有隙，致使不安，若明以宪章，则轻重有不可怒；若论相从之始，则国有八议，故不夺其名，而夺其禄”来看，朱元璋是完全相信了胡惟庸的构陷，认为这是刘基的“不可恕”之罪。

刘基明白，这时默默忍受对他是最好的选择。为了消除朱的疑忌，他立即回到京师，不敢有任何申辩，“惟引咎自责而已”(《行状》)。

洪武六年(1373年),丞相汪广洋被贬广东,胡惟庸为相,独掌中书大权。刘基见情势如此,心中忧愤,曾对人说:“使吾言不验,苍生之福也;使吾言验,其如苍生何(《明太祖实录》卷99)!”没有多久,刘基就得了病。

洪武八年正月,朱元璋派胡惟庸探视刘基病情,胡随身带的医生为刘开了医方。刘基吃了两付药,就觉有拳头大的东西积在胸口,硬如铁石。两个月后,病势就沉重起来。朱元璋知道他快要死了,便派人护送他回乡。到家只一个月,就在洪武八年四月十六日(1375年5月16日),离开了人间。他生在元武宗至大四年六月十五日(1311年7月2日),终年六十五岁。死的前几天,他取出天文书递给长子刘璉,让他尽快上交朱元璋,说:“毋令后人习也。”又对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祁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我所间,以是密奏之”(《明史》卷128“刘基传”)。

五年以后,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揭发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谋反时,才揭出了刘基暴死的秘密,原来“惟庸挟医往,以毒中之”(《明太祖实录》卷129),是胡惟庸指使他带的医生在药中下了毒!刘基死后不久,他的长子刘璉在江西参政任上也被胡惟庸的党羽胁迫,坠井而死,死时只有三十二岁。洪武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间,刘璉之弟刘璟进京,朱元璋曾多次当面对他说,是胡惟庸一党害死了你的父亲和哥哥。朱说:“后来胡家结党,他吃下他的蛊。只见一日来和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怕凉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着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他大儿在江西,也吃他药杀了”(明·刘璟《遇恩录》)。

孔颖达注释《左传·昭公元年》“何谓蛊”一语说:“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胡惟庸正月视疾,刘基三月病重还乡,四月死去,可知胡下的是慢性毒药,以此巧妙掩饰其杀害刘基的痕迹。

但是,事情是否仅此为止?这与朱元璋本人有什么关系没有?至今仍然是个谜。因为,朱明知胡、刘二人如火水不容,却为何要派胡去看望刘基?刘基服药病势转沉,向朱元璋反映情况时,为何朱丝毫不予理会?朱赐刘基归老青田的诏书中,为何竟说:“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并把刘比作顾恋旧巢的禽鸟,说什么“商不亡于道,官终老于家,世人之万幸也”?刘基死时,朱为何毫未怀疑而后再说得如此肯定?胡惟庸视疾,本为朱元璋所派,为何《明实录》和《行状》于洪武八年条内却完全隐瞒这一情节,只说“八年正月,惟庸以医来视疾”,莫非有所忌讳?所以钱谦益以历史家的笔触写道:“胡惟庸之毒诚意也,奉上命挟医而注”,语中就隐约有朱元璋授意或怂恿胡惟庸去干的意思。

太祖悲咽女子受难



「中国秘史」 中国全史大系

明初尤重孝道，明太祖朱元璋不仅令世人行孝，他自己也以身作先之。他自称孝子皇帝，每祭太庙，就悲咽泣下。他命人画《孝行图》以示子孙，教育他的儿子们“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国朝》卷6）。马皇后去世，谥号“孝慈”，葬地曰：“孝陵”。明代皇帝帝号、庙号、谥号、陵号，孝字甚多。如孝宗、孝康、至孝、纯孝、广孝、达孝等，可以说，都是受到朱元璋的影响。明重奖励行孝，尤重民间，“凡有孝行节义，由各地方申报，风宪官复实奏闻，即于旌表。其后止许布衣编民、委巷妇女得以闻名。其有官职及科目出身者，不与焉”（《明会要》卷14《旌表》）。因此，明初民间行孝之事，史载具多。弘治年间处士贞孝先生莫巽仲，“洪武初，父系诏狱、将刑”，莫当时只有十一岁，“赴官认罪，愿代父死。法司奇之，试加胁诱无异词，送奏释其父”。后来他的季父一家俱坐，莫含辛茹苦，抚养遗下的幼子。（以上见《弘治吴江志》卷9《乡贤》）祥符人丘铎，“母卒，哀恸几绝，葬鸣凤山，结庐墓侧，朝夕上食如生时”（《明史》卷184）。浙江山阴人徐允让，兵乱之时，遇强人，其父被杀，“允让大呼曰，宁杀我勿杀我父！”（《明史》列传184）。洪武时，江宁人周琬，其父怀罪当死，琬当时十六岁，叩请代父一死，朱元璋看其诚，不仅释放了他的父亲，而且授给周琬官职，让他做兵部给事中。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月，礼部在给朱元璋的奏疏中说：开封府钧州民张宗鲁，四岁失明，二十遭乱，负母路氏逃难，其妻挟掖以行。兵荒马乱之时，宗鲁卖卜以为生。日给不足，他的妻子采野菜来充饥。天下既定，宗鲁奉母还故乡，竭力供养。他的母亲死后，又找到其前母鲁氏、沈氏、吴氏三人的遗骸，合葬父母。明初乡间行孝之举，不仅为统治阶级所赏识，而且也为乡里之人所赞誉。世人多以行孝之举为楷模。《吴江县志》记载如下之事：

永乐中，吴江徐昌伯谪戍辽东。当行，其弟季昭念有母老，托兄供养，而欲以身代行，昌伯又念弟未经事，不欲其往。两人相让久之，季昭乃行，而昌伯在家养母。后十余年，季昭还家，而母兄俱无恙，相见欢然。乡人重之，为扁其所之堂，曰孝义焉。（《弘治吴江志》卷12《杂记》）

可见，当时乡间评判人物善恶之标准，乃是以儒家的伦理作为尺度的。孝，应当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之一，但明初大力提倡孝道，是为了以孝道而收敛人心，从而使人们服服贴贴地服从统治阶级的奴役。因而这一时期的孝，也往往被提到不适

当的程度，民间孝义之风炽烈，有时竟然达到愚昧之程度。《弘治吴江志》中记，吴廷用“年十一而孤，母陆氏孀后不嫁。永乐癸卯(1423年)，朝廷选天下孀妇之贞者，以备内役，而陆以例行。宣德丙午(1426年)，吴随亲王出封广东，改封饶州。到正统时，其母陆氏“病笃，不能言矣，吴(廷用)彷徨无措，乃出而割股作糜以进，陆啖之遂苏”。(卷11《孝子》)类似这种荒唐之举，《明史》中也有不少记载。澄城李茂，其母患恶疮，“茂日吮脓血”，使其母亲病愈。有名叫江伯儿者，“母疾，割惨肉以疗，不愈”，又“愿杀子以祀。”这种孝道，实在有点惨无人道。其人行孝，也许是真心为母，但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恐怕多是沽名钓誉。世人以孝来评判人的行为，而人在世风熏陶之下，为得到一个“孝”名，虽杀子毁身而在所不惜，这充分证明了明初以封建礼教为中心的人生价值观念，已使一部分人的心理行为近乎于愚昧和麻木，从而也就暴露了明初人们心理行为中不合理的一面。

中国封建时代，大都重视妇女的贞节。明初不仅提倡贞节，而且还改进了褒奖节妇的办法。洪武元年(1368年)曾下诏书：“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会典》)。仁孝文皇后还专门写了一本严格约束妇女的书——《内训》，把妇女守节提高到有关国家兴废之高度。统治阶级在思想上提倡妇女守节，同时又给予节妇之家以经济上的优待，致使一些妇女在丈夫去世之后，往往被父母强迫守节。因此，明代节妇最多。查二十四史，别的封建王朝记载节妇之数，没有超过明代的。《明史列传》中所记有名的节妇达三百零八人，而修史时下边往上推荐的节妇数有万人之多。这些人中，明初尤甚。《明史·列女传》序言指出明代表彰节妇之盛时说：

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子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

史载刘孝妇，婆母病，“刺血和药以进”。丈夫下世以后，自种蔬菜养活婆母。二年以后，婆母患风病不起，刘昼夜守护，不离左右。婆母因久卧病，身生蛆虫，刘氏又用牙齿啖蛆以减轻婆母病苦。又记，高氏女，“夫早卒，独持门户，孝事姑。宣德时，翁姑并没，以礼葬。”明代正史、地方史志列明初节女之多，各地树起的贞节牌坊之众，体现出明初以贞节是尚的价值观念，它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的贞节观对于妇女人身和心灵的摧残。

明代隐士

明初实行苛政，法网太密，士大夫“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秩，不少顾惜。”（《二十二史劄记》卷32）洪武九年（1376年），平遥训导叶伯巨上疏中说：“古之仕者以登籍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仕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贴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箠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网罗天下士，若恐有失，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选除，多以容貌……一陷于法，苟免诛戮，屯田工役为轻典矣”（何乔远《名山藏》《臣林志·叶伯巨》）。这些，都促使明初的一部分士子很自然地选择了隐逸这一消极对抗的斗争方式。尽管明初屡屡下诏，征集山林隐逸，起用岩穴之人，但应诏者却寥寥无几，以致于朱元璋后来不得不颁布《大诰》，明令“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皆至抄斩”，对不应征诏者给以严惩。但是那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应诏的士子，后来不少又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辞去官职。

明初士子多举隐逸之行，自此可见一斑。

明初士大夫阶层中一部分人的隐居不仕，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固辞征辟、甘作抗节遁迹之士者。据《明史·隐逸传》中记载，绍兴人杨恒，以学而闻名，朱元璋下浙东之后，绍兴知县栾凤多次奉诏请杨作州学师，而杨恒坚守不出。后来唐铎知绍兴州，又多次荐举杨恒，杨又固辞不应。闽县人吴海，元末以学行称于当世。明朝建立之后，闽县守臣欲荐举他入朝为官，吴执意不肯。之后又征诣史局，吴“复力辞”。长洲人沈启南之祖父沈澄，永乐间举人材不就，每日在家置酒与人款饮。明初这种自始不应征召者多不胜数。明初的不少诗人中也有不少抗节隐居之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记有不少这类诗人的隐逸之举。曾经应奉元代翰林文学的李祁，元末隐居于永新山中。明朝建立后，多次征辟，但李均未应征。和他同年中进士的王子让，元亡之后，“累辟不出，以铁拄杖采诗山谷间”。丁鹤年世代仕元，元亡后不忘故国，洪武十三年（1380年）元北遁后，悲痛欲绝。晚年学浮屠之法，结草庐于父亲墓旁，以终其身。王翰原是陈友定幕府，陈友定被灭后，王不受明朝征召，隐居在永福县东边的观猎山。后来，明廷又下书征辟，他对家人说：“吾所以不死者，为无后也。今有三男子，得死所矣”，遂自裁而死。华亭人全思诚，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耆儒由本郡学正徵授文华殿大学士，但他坚辞不受。他如舒頔，高卧北山，坚辞征辟，曾作诗“湖海半生客，乾坤一布衣。善哉周伯叔，饱食首阳薇”，矢志学伯夷、叔齐，不仕新朝。刘养晦元末避乱于龙头山，明统一后，深隐不出，他有诗“谢安原辅晋，李密固兴唐”，表达不与明王朝合作的决心。倪云林是明初有名的隐士，《明史》本传说他“及吴平，瓚年老矣。



黄冠野服，混迹编氓。”他的诗“轻舟短棹向何处，只傍清波不染埃”（《题彦真屋壁》）、“晚年传得登真诀，归卧南山涧谷中”（《追和苏文忠公墨迹卷中诗韵》），表现了他对明初对于隐逸生活的追求。顾宪成在《清閼阁集序》中说：“高皇龙飞淮甸，贤哲景从，天地重开，日星再朗，士于其间多风云着志，草野埋光，交相应和，以更世道，而以奇逢怪愕，砭肌入骨，痛刮积秽，则先生一人是已。”顾氏所论不乏过誉之辞，但却表现了明初隐逸之士以隐逸之举以反抗明朝统治的思想情绪。

明初士大夫抗节隐居的第二种情况，是出仕之后又坚决辞官。出于对朱元璋高压政策的恐惧，明初士子中不少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违心到明朝政府里边去作官。但是，他们内心对明朝的不满情绪并未消失，许多人在应征之后又找借口辞去官职，敝履尊荣，重新去过隐居的生活。这时，“天下诸儒应明诏来京师者，咸器而官之，以亲老辞归者若干人”（《见清江先生全集》卷20《卷陈复礼归四明序》）。铁崖先生杨维禎，元末以文学著名。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慕其名，下诏征见，让其进京修礼乐之书。杨对使者说：“岂有八十岁老妇，就木不远，而再理嫁者耶？”

第二年，诏书又下，杨云“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明史·杨维禎传》）。之后虽被迫进京，但只在京城住四个月，在修完礼乐书后，以白衣乞骸骨为由归家。江阴人王逢，元末感于世乱，避于淞江。明建国之后，他多次写诗发泄内心不满。他在诗《戊申元日》中云：“月明山怨鹤，天黑道横蛇。”《丙寅筑城》中又云：“儒子成名狂阮籍，伯才无主老陈琳”。伤元主之北遁，哀皇孙之被俘，思故国之旧主，愤新朝之建立。黍离之泣，激昂恹叹，均见于诗端。朱元璋灭张士诚后，“欲辟用之，坚卧不起，隐上海之乌泾，歌咏自适”（《明史·王逢传》）。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又下诏以文学征用，敦迫王逢进京任通事司令。后来王逢之子掖以父年迈，叩头泣请，才得以返乡。浦江人戴良，元亡之后，隐名埋姓，隐居于四明山。其间所作诗，多怀念故国旧君之辞。朱元璋多次征辟，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才被迫进京。太祖授他以官，他又以年老多病坚辞，以致“忤旨待罪”，在次年四月，自裁于寓所。诗人袁凯，洪武三年（1370年）被迫入京，任监察御史。后因触怒朱元璋，不得不假装疯颠，得以全身还乡。

诗人贝琼一开始就对征辟不满，在诗中云“王事忽相縻，遂令违我心”。但在“高皇帝方以猛纠之，士大夫重足屏息以营职业，不侧倖狂自放，庶几于无咎焉”（娄坚《王常宗不传》）的时代，他不得不去干违心的事。但即使在他应召之后，还时时想着“终当返田里，灌园希汉阴”（《贝清江先生全集》卷3《赴台留别诸友》），后来终于又辞官回家。像这类隐逸者，明初颇多。另如张天英在明初征为国子助教，后辞官隐居西湖；熊梦祥被举为教官，后弃官而去，以诗酒放浪于浙淮之间。在明初，不与明朝合作而走上隐逸之路，几乎成为士大夫们的一种风气。宋濂《送徐大年还淳安序》中记载，徐大年辞官返乡，人们诋诮相夸，言其能“独善以固穷”，可见当时人们对这种隐逸不仕的做法是持赞赏态度的。中国的士大夫历来以积极入世著称，明初众多士子走上隐逸之路，是他们在对现实不满，而又无力去改变现实时采取的一种消极反抗。从这种无声的反抗中间，我们看到的正是明初苛政之下知识分子恐惧不安、远祸避害的心理状态，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初骚动不安的社会情绪。

胡惟庸寸磔市曹

明太祖老怕廷臣蒙蔽，常与侍从数人，易服微行，一面采访才能，一面侦察吏治，一面调查民情，所以江淮一带，常有太祖君臣踪迹。相传太祖微幸多宝寺，步入大殿，见幢幡上尽写多宝如来佛号，因语侍从道：“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学士江怀素闻言，知太祖意在属对，便脱口答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恰是绝对。太祖大喜，而擢为吏部侍郎。迨入游方丈，见有纸条粘贴门首，上书维扬陈君佐寓此。君佐少有才，脱落不羁，曾与太祖有一面交，太祖立呼相见。君佐出谒毕，太祖笑问道：“你当初极善滑稽，别来已久，犹谑浪如昔么？”君佐默然。太祖又问道：“朕今已得天下，似前代何君？”君佐道：“臣见陛下龙潜时候，饭糗茹草，及奋飞淮泗，与士卒同甘苦，犹食菜羹粝饭，臣以为陛下酷肖神农，否则何以尝得百草？”妙语解颐。太祖鼓掌大笑，令他随行。偶过酒肆，太祖即带同入饮，酒肆甚小，除酒豆外，没甚菜蔬。太祖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君佐随声应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属对亦工。太祖又大笑，并语君佐道：“你随朕入朝，做一词臣，何如？”君佐道：“陛下比德唐虞，臣愿希踪巢许，各行其志，想陛下应亦许臣。”是田兴第二，兴且不入正史，遑问君佐？此史笔之书疏忽处。太祖乃不加强迫，与他告别自归。

越数日，以出外微行，偶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便与坐谈。士人自称重庆府监生，太祖又命属对，出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士人也不假思索，便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太祖大喜。无非喜谀。问明寓址，方与作别。次日，即遣使赍赏千金，士人才知是遇着太祖，欣幸不已，大约有些财运。太祖又尝于元夕出游，市上张灯庆赏，并列灯谜。谜底系画一妇人，手怀西瓜，安坐马上，马蹄甚巨。太祖见了，不禁大怒，还朝后，即命刑官查缉，将做灯谜的士民，拿到杖死。刑部莫名其妙，奏请恩宥。太祖怒道：“褻渎皇后，犯大不敬罪，还说可宽宥么？”刑官仍然不解，只好遵旨用刑。后来研究起来，才知马后系淮西妇人，向是大脚，灯谜寓意，便指马后，所以触怒太祖，竟罹重辟。做了一个灯谜，便罹大辟，可见人贵慎微。

且说太祖得国，武臣立功，要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要推李善长、刘基。刘基知太祖性质，所以封官拜爵，屡辞不受。善长官至右丞相，爵韩国公，免不得有些骄态。太祖有意易相，刘基谓：“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易。”太祖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基顿首道：“譬如易柱，必得大木，若用小木作柱，不折必仆，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太祖道：“杨宪何如？”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太祖复问道：“汪广洋如何？”基又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太



祖又问及胡惟庸，基摇首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猷，一经重用，债辕破犁，祸且不浅了。”太祖默然无言。已而杨宪坐诬人罪，竟伏法。善长又罢相，太祖竟用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相。广洋在相位二年，浮沉禄位，无所建树，独惟庸狡黠善谄，渐得太祖宠任。太祖送罢广洋职，令惟庸升任右相。刘基大喊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若使 my 言不验，还是百姓的幸福呢。”惟庸闻言，怀恨不置。会因瓠闾间有隙地，名叫谈洋，向为盐梟巢穴。基因奏设巡检司，盐梟不服管辖，反纠众作乱。基子璉据实奏闻，不先白中书省，惟庸方掌省事，视为蔑己，越加愤怒，遂主使刑部尚书吴云劾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基欲据以为墓，应加重辟。太祖似信非信，只把基夺俸，算作了案。基忧愤成疾，廷医服药，反觉有物痼积胸中，以致饮食不进，遂致疾笃。太祖遣使护归青田，月余逝世。后来惟庸得罪，彻底查究，方知毒基致死，计出惟庸，太祖很是惋惜。怎奈木已成舟，悔亦无及了。刘基无智术，惟如后人所传，称为能知未来，不无过誉，使基能预算，何致为惟庸谋毙？

惟庸既谋毙刘基，益无忌惮，生杀黜陟，为所欲为。魏国公徐达，密奏惟庸奸邪，未见听从，反被惟庸闻知，引为深恨，遂阴结徐达阍人，嗾使讐主。不料阍人竟直告徐达，弄巧转成拙，险些儿禄位不保，惊慌了好几日，幸没有甚么风声，才觉少安。患得患失，是谓鄙夫。继思与达有隙，究竟不妙，遂想了一计，嘱人与善长从子作伐，把侄女嫁给了他，好与善长结为亲戚，做个靠山。

善长虽已罢相，究尚得宠，有时出入禁中，免不得代为回护。善长之取死在此。惟庸得此护符，又渐觉骄恣起来。会惟庸原籍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竹笋，高至数尺，一班趋附的门客，都说是瑞应非凡。又有人传说，胡家祖父三世坟上，每夜红光烛天，远照数里。看似瑞应，实是咎征。惟庸闻知消息，益觉自负。是时德庆侯廖永忠，僭用龙凤，太祖责他悖逆，赐令自尽。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言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又触太祖盛怒，下狱瘐死。此二事插入，是宾中宾。内外官吏，岌岌自危。

寻又因安吉侯陆仲亨，擅乘驿传，平凉侯费聚，招降蒙古，无功而还，皆奉诏严责。此二事是主中宾。二人心不自安，惟庸乘机勾结，联为羽翼。令在外收辑兵马。又阴结御史中丞陈宁，私阅天下兵籍，招勇夫为卫士，纳亡命为心腹。一面又托亲家李存义，即李善长弟。往说善长，伺间谋逆。善长初颇惊悸，以为罪当灭族。嗣经存义再三劝告，也觉依违两何，不能自决。为此一误，已伏死征。

惟庸以善长并未峻拒，以为大事可就，即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约倭寇，又遣无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请为外应。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正在日夜谋变，又闻汪广洋赐死事，益加急迫。原来广洋罢相数年，又由惟庸荐引，入居相位，惟庸所为不法，广洋虽知不言。会御史中丞涂节，上陈刘基遇毒，广洋应亦与闻，太祖遂责广洋欺罔，贬戍云南，寻又下诏赐死。于是惟庸益惧，一面贿通涂节臂助，一面密结日本贡使，作为退步。洪武十三年正月，惟庸入奏，诡言京宅中井出醴泉，邀太祖临幸。太祖信以为真，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突冲辟道，勒马言状，气逆言结，几不成声。太祖以为不敬，叱令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势且垂毙，尚手指惟庸宅第。太祖乃悟，忙返驾登城，遥望惟庸宅中，饶有兵气，知系谋逆，立发羽林军掩捕。涂节得知此信，也觉祸事临头，意图脱罪，急奔告太祖，说是惟庸妄谋劫主。道言未绝，羽林军已将惟庸缚至，由太祖亲自讯究。惟庸尚不肯承，经涂节质证，不能图赖，乃将惟庸牵出，寸磔市曹。

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朱棣不失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明代16位嗣君中，他是最可称道的。他统治的二十二年(1402—1424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也是最光辉最活跃的时代之一。

他的雄心、猜疑、残忍和其父朱元璋有共通之处，而他的国际视野，却比朱元璋更开阔。在对外关系上，锐意进取，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重点实行开放政策。在他看来，只有树立起中国在国际上的崇高威望，建立起国际和平的环境，中国才能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盛世景象。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创立者，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政治方面，对外着重于“防”，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这与时代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其忽视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关系，推行海禁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国与海外国家间的关系逐渐削弱，许多国家已多年不派使臣来华。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明显下降，兴武十三年(1380年)甚至出现爪哇国无端杀害中国取道爪哇去三佛齐国的使者这类大大损害国威的事件。周围的国际环境很不安宁，最突出的问题，是安南国(今越南中北部)国相黎季在建文二年(1400年)夺取该国政权以后，奉行侵略扩张政策，不仅向南侵占了占城国的大部分领土，并且向北侵占了广西思明府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进而将侵略魔爪伸向云南，造成了中印半岛和中国西南边疆的紧张局势。中国东南沿海以至南海、南洋群岛一带，局势也不稳定，部分残留的反明武装力量和一些不法亡命之徒，以沿海岛屿为巢穴，不仅经常骚扰沿海大陆地区，并且为盗海上，劫掠过往商旅，阻挠中外贸易，劫持各国来华使节，阻断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正常交通往来。自有一番抱负的成祖，当然不能听任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

另外，此时国内经济十分富庶。朱元璋本是贫苦农民的儿子，深刻体会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的道理。他吸取元朝覆灭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措施，经过三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出现了“仓廩充积，天下太平”、“外户不闩，道不拾遗”的稳定繁荣局面。农田耕种面积比洪武初年扩大了四倍，库存粮食比元朝增长了两倍，从京都到各州、府县的粮仓里，粮食都堆得满满的，有的已经陈腐发红而不能吃了；纺织、矿冶、陶瓷、造船、印刷等手工业生产，都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全国形成了三十三个大都市，商业贸易空前活跃，国家的财政收入，足以支付南讨交趾(安南)、北征沙漠、营建北京、遣使西洋等各项巨大费用。内河、海道、陆路交通都很发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刺激了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追求，再次提出了积极开展海外贸易的需要，海外国家同样也有来中国进行贸易的愿望。

与此同时，京都和各地传闻四起，纷纷扬扬，南京城破之日，建文帝没有蹈火自



焚，那是从瓦砾中扒出来的、烧焦了的尸体，乃是皇后马氏的遗骸。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当靖难军攻入南京时，一位太监提醒朱允炆说：太祖临终之前，曾留下一只铁匣，叫建文帝在危难之时方可启看。建文帝忙差人把那只铁匣拿来打开一看，里面放有剃刀、僧帽、袈裟和一张度牒（和尚的执照）。建文帝明白太祖的用意，遂装扮成和尚的模样，从宫内水道中逃走。对于建文帝逃亡的去向，则众说纷纭，有说云游国内云南、四川、江苏各地，也有说已经远遁海外。对此，成祖朱棣深感不安。因为他是凭借武力推翻侄儿朱允炆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在今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次皇室内部的夺权斗争，在中国历史上也不罕见。而在当时人看来，则是一件以庶篡嫡、背祖乱宗的犯上行为，不仅前朝旧臣饮恨含怨，日思兴复，在“瓜蔓抄”（指对所谓建文帝死党及其亲友家属的查抄和诛杀）酿成的一件件血案中，很少有人屈膝求饶。就是一般百姓，心理上适应不过来，苏州地区的百姓就曾乘机闹事。朱允炆作为正统的继承人，作为“仁”君，在人们的心目中仍有号召力。朱允炆的存在，对朱棣帝位的巩固和政治的稳定，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为此，他一面派胡濙遍行国内各州、郡、县，暗中察访，同时也拟派人去国外了解建文帝的踪迹，顺便了解各国对他即位的反映，并向各国政府宣传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争取各国的拥戴和归附，借以转移视线，安定国内民心。

从以上种种需要出发，自成祖登基后第三个月起，就派遣大批使者四处活动，无论是东是西，还是东南或西北，也不论是远是近，还是陆地或海上，“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同时明令宣布，欢迎各国使者前来中国，明朝政府一律以诚相待，既可以在政治上建立外交关系，也可以在经济上开展贸易。对于携带本国产品来中国交易的，中国政府不加干涉，对于某些误犯禁律的行为，中国政府也不治罪。还下令恢复了被朱元璋废除的市舶司（相当于现代的海关）制度。重新在浙江、福建、广东设立市舶提举司，专门负责检查出入海港的船舶、征收商税、收购政府专卖品和管理外商等事务。各市舶司设置驿馆，负责招待海外各国来华的使者和商人。在最高学府翰林院内开设“八馆”，培养通晓西文（印度）、回文（阿拉伯）、缅甸文、蒙古文、女真文等八种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招收年轻的举人和国子监太学生入学，称为“习译书”。所有这些，都表明成祖要拓宽对外友好的大门，以实现其“超三代而轶汉唐”、“内外安宁、永世太平”的宏愿。

就以遣使西洋来说，在郑和之前，就有闻良辅、宁善、侯显、马彬、李兴、尹庆、张谦、谭圣、杨信、周航等人，分别前往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暹罗、旧港、苏门答腊、柯枝、西洋琐里、古里等国，这些国家也多派使者，随之来中国回访。郑和下西洋，只是继此以后的规模最大的外交贸易活动，是明成祖对外开放政策的集大成之举。

郑和使团每访一个国家，首先进行的是一系列外交礼仪，然后开展多种形式的贸易活动；贯串在这两项活动中的，是传播中国的先进文明，以感化各国归慕之心，除此之外，还负有肃清海远、缓解各国间的矛盾、建立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和平局势等多重使命。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军事的，也有文化的。郑和下西洋先后有七次，每一次所处的背景和要完成的使命也不尽相同，所以对某一次的目的，还要做具体的分析；笼统地以某一个目的来概括郑和下西洋的全部活动，是困难的，也是不恰当的。明清以来，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也反映了郑和下西洋动因和使命的复杂性。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从总体来看，政治上的目的是首要的。也就是要实现成祖给海外国家敕书提出的“君主天下，万国顺服”的目标；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的目的是次要的，是从属于政治目的的；至于探寻建文



帝的下落，则是开始几次的附带目的，并且是由郑和等少数领导成员秘密掌握进行的。

得知成祖已经决定派遣庞大船队下西洋，郑和心中无比激动。想起前几日，成祖主持朝廷议论，很多老臣搬出“太祖旧规”，力主取消此举。成祖回宫，与郑和商量，郑和奏道：“臣观汉唐之盛，皆主张和世界相通。今我大明的富强，重在开拓南部海疆，若我以强大舟师巡弋海上，则倭寇远遁，海道清宁，中外通好，万国来朝。如今我朝与海外已多年疏于联系，彼此对近况都不了解，不了解就无从信任，不信任又怎谈友谊？所以，派遣强大舟师远使西洋，乃实现圣上‘四海一家，共享太平’宏图的必要之举。”现在成祖决心已下，那班持异议的老臣们也只好缄口不语了。

不两日，这班老臣又活跃起来了，原来是成祖要挑选下西洋总兵正使的人选。在这班人看来，充任这样一件旷古未有的大事业的指挥者，应该是深孚众望的文官，或者是战功赫赫的武将，但是他们又看到，成祖登基以来，派往出使外国的大多数是内官。一看到这些宦官，他们就厌恶，很自然地流露出轻蔑的表情。他们联合外廷众大臣，公推新城侯张辅出面，抢先保举吏部尚书蹇义出任此职。

张辅是河间王张玉的长子，随父从燕王起兵，屡建战功。朱棣称帝后，初封信安伯，永乐三年进封新城侯，永乐六年进封英国公。张辅治军整肃，临变不惊，三定安南，威名闻于海外。历事四朝，英宗时，死于“土木之变”，追封为定兴王，谥号忠烈。蹇义，原名瑑，洪武十八年进士，朱元璋见其忠厚诚实，手书“义”字，赐以为名。惠帝时任吏部右侍郎，朱棣称帝后，任吏部左侍郎。后因敢于直谏，为成祖所倚重，升为吏部尚书。成祖北征，命义辅佐太子监国。与户部尚书夏原吉齐名，中外称为“蹇夏”。仁宗时初进为少保，后进为少师（少师、少傅、少保合称三少，为辅导太子的官职，由朝臣所兼任），与张辅、夏原吉三人共同监修《太宗实录》。宣宗即位委命益重，英宗时病逝，谥号忠定。客观公正地说，这二人无论是举者或被举者，都是朝廷百官中出类拔萃的名将或贤臣，问题只在于成祖对朝廷众臣的用心早有所察，对统领下西洋的人选已另有所属。所以，对此保举未加可否，只说“朕自有主张”。散朝回宫后，成祖召来当时著名相术家袁忠彻，问道：“以三保（指郑和）领兵如何？”袁忠彻回答说：“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

成祖为什么会属意郑和呢？这固然是因为他对宦官的信任和重用（这点前文已经作了说明），其中郑和又是从小在他身边长大，一贯对他忠贞不二，被他视为心腹；还因为郑和的本职是内官太监，下西洋修造海船、采办珍奇宝物和各种器皿，用以营造和装饰南北宫殿和满足皇室消费，正是其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尤为重要的，是郑和具有别人无可替代的多方面的才能：

其一：郑和知兵法，有谋略，指挥得宜，勇敢善战。郑和下西洋前夕，西洋各国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局势动荡不定，其表现有爪哇三人为古城所掳的摩擦，爪哇西王与东王的内战，安南对占城的入侵，还有暹罗欺凌满刺加，爪哇奴役三佛齐，锡兰施暴诸邻国等等；海面上也极不安宁，元朝和元末起义的方国珍、张士诚等残部，勾结一些亡命海外的人，集舶为寇，劫掠过往船只。在这海外不靖，商旅阻遏的情况下，要保证船队的安全和顺利完成出使任务，没有强大的自卫武装力量是不行的，要求这次支庞大船队的统帅，必须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是完全必要的。

其二，郑和知识渊博，熟悉西洋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宗教习俗，通晓阿拉伯语言文字。

在中世纪航海史上，阿拉伯人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是由阿拉伯地区处于东西方之间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他们拥有丰富的航海技术和进行海上贸易的经验。从很早的时期开始，阿拉伯就是地中海各国和远东交通的枢纽，波斯湾也是航海贸易的摇篮。在阿拉伯语中至少有200多个关于船的词，阿拉伯商船曾抵印度、东南亚、中国和非洲，穿梭于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上，甚至到过东欧和北欧。就这次下西洋活动来说，阿拉伯半岛又将是郑和船队访问的主要地区。因此，具备这项条件，对完成出使命是非常有利的。

其三，郑和有一定的航海和造船知识。在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海洋上，不熟悉各地的路程远近、方向位置、海水深浅、停泊处海底情况，不掌握风云气候、水势流速、潮汐涨退等等规律，不懂得罗盘、计程仪、牵星板的使用和物标导航、天文定位、船舶驾驶与修理等知识，就难以安全行船，横渡重洋。从永乐元年(1403年)起，郑和就进行过几次小规模的海上活动，访问暹罗、日本等较近的海外国家，两年左右的航海实践，为郑和领导下西洋大规模活动，取得了经验。

其四，郑和既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又是受了菩萨戒的佛家弟子。在郑和出使的绝大多数亚非国家中，不是以伊斯兰教就是以佛教为国教。在南亚，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数占居人口的70%，中亚和西亚阿拉伯地区，更是伊斯兰教的世界；在东南亚一带，信奉佛教的人数占居民人口的90%以上。共同的宗教信仰，成为维系各国人民之间感情的纽带，有助于缓解各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沟通和建立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对郑和出使任务的圆满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五，郑和有卓越的外交才能，这在郑和奉命出使日本的活动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倭寇骚扰中国沿海一带，是元末明初之患。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奉命前往日本，通过与日本国国王源道义(足利义满)具体磋商，宣谕了明王朝的威德，促使日本国主动出兵剿捕侵掠中国沿海的倭寇，并将其主要头目俘献中国；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勘合”本用于调军队，洪武十五年开始用于贸易，即是一种辨别真伪、防止假冒的凭证，贸易双方各执一半字牌和各存一份底簿，贸易时按号对照字牌，查验底簿，合则准许贸易，不合则予没收，起到限制非法贸易的作用)。自此，倭寇有所收敛。成祖对郑和这次出使的结果非常满意，主动封日本国阿秀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并亲撰碑文、铭诗以记其事。郑和使日的成功，还为下西洋之举解除了后顾之忧，一些对宦官怀有偏见的大臣，也不得不表示叹服。

所以，当近臣刘诚意举荐郑和出任下西洋统帅时，成祖当即采纳，并传旨召见郑和。对此《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

圣上道：“刘诚保你下得西洋，挂得帅印，你果是下得西洋吗？你果是挂得帅印吗？”三宝太监道：“奴婢仗着万岁爷的洪福，情愿立功海上，万万扬威。奴婢是下得西洋，奴婢是挂得帅印。”圣上道：“你可知此去任务是什么？”三宝太监道：“寻惠帝，出使西洋诸番国；增友谊，传播文化，沟通贸易，扬我明威。”圣上道：“遇有阻力如何？”三宝太监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情来情往，仇来仇还，奴婢当会见机行事。”圣上道：“海上难行，你可知兵习战？”三宝太监道：“海上用兵，略懂一二，遇有海盗抢劫，定杀他个鸡犬不留。”圣上道：“尚不知熟悉西洋诸番国风土人情否？”三宝太监道：“奴婢自幼听得祖父身教言传，已懂得回教之国，佛教之邦各种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奴婢此下还是个虔诚的回教徒。”郑和如此这般地对答如流，圣上听了大喜。最后圣上道：“递印与他，写敕与他。”

三宝太监于是挂了印，领了敕，谢过皇恩，忙退了下去。



僧人佐政

在朱棣夺位的过程中，僧人道衍起了很大作用。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因道衍功高，授之以僧录司左善世之职。永乐二年(1404)四月，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姚，赐名广孝。成祖和他谈话时，亦称之为少师，而不呼其名字。

这时的姚广孝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自己早年的夙愿，并完全可以在永乐时期的政治舞台上表演一番了。然而，事实却不如他想象的那样。人们对他的行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姚广孝有个姐姐，听说他助燕王起兵时，就曾发出“和尚慈悲如是乎”的感叹。当他功成业就，衣锦还乡，希图光宗耀祖时，他的姐姐不但不前往迎接，反而在他要求会见时，闭门不纳，还嘲讽地说：“贵人来何为？”姚广孝只好换掉身上的僧服，再去请求会见。他的姐姐仍旧不接见，过了很长时间才得入中堂。广孝想行拜礼，他的姐姐却说：“你不要拜。学佛不能坚持到底，姐姐怎能有这样的弟弟！”他在家乡访其好友王宾，王宾也不见，只是遥遥地看着他：“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广孝只得惭愧而退。

看来，他的抱负虽然实现，但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认为他的行为背离了身披的袈裟。这时，他性格的两重性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方面他受宠于朱棣，为心腹谋士，助其起兵成功，位居高官，实现了昔日的理想，使他感到最大的快慰；另一方面，他也亲眼看见，在自己策划下的这场战争中，给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使他们惨遭杀戮，田野荒芜，这不能不使一个从十四岁就出家为僧，接受佛家说教，时刻应以慈悲为怀的人，在良心上受到谴责。友人的拒而不见，亲人的弃而不纳，对他又是何等大的打击！“何如东流水，写此长恨端”的诗句，就表达了他的忏悔心情。

一个善于观察和思考、曾有过大作为的政治家和谋略家，此刻能静心反思，急流勇退，确也十分难能可贵。永乐皇帝让他蓄发还俗，他不愿意；特赐他宅第于京师崇文门右，他也不接受；为他卜妻择偶，他更谢不奉诏。他仍旧是“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而缁衣”。这时的姚广孝好像对自己的前半生的所作所为有所悔恨。从而想抛却尘世的权欲，世态的炎凉，而在佛门这块“净土”中安度晚年，“超度”在自己策划的战争中丧命的无数苍生。据清代进士刘涓金说：“姚广孝隐茜泾后，有幽居诗两句云：‘春燕雏成辞旧垒，午鸡啼罢啄阴价。’因杀业太甚，故终身为僧而不改。”

姚广孝在永乐初年曾出赈苏、湖，到达长洲时，还曾以皇帝赐给自己的金帛散给宗族乡人。此后重修《太祖实录》，广孝为监修；又与解缙等纂修《永乐大典》。其时北疆不宁，永乐帝多次出塞亲征，广孝都留京师辅佐太子。永乐五年(1407年)，皇长孙

出阁就学，广孝侍书。此后，他就退隐了。

永乐十六年，八十四岁的姚广孝到达北京。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不能上朝，仍旧住在庆寿寺。成祖对这位助已夺取皇位的大功臣，并未忘弃，几次车驾临视，交谈仍旧十分融洽。一次，成祖问广孝：“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话要说，可以直说。”姚广孝这才说：“溥洽是个好和尚，下狱已经十几年了，我请求皇上赦免他。”为什么姚广孝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唯一关心和不能忘记的却是为一个和尚求情呢？

原来在建文四年六月，燕王率兵入金川门时，皇宫中忽然火光四起。燕王派人四处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得到的回答却是：“帝不知所终。”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做皇帝是须受有“天命”的，敢于反叛朝廷的人则被视为乱臣贼子。朱元璋钦定的皇位继承制度，子孙也是不能有丝毫改变的。燕王早有夺位的野心，但起兵之时也不得不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如今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等人都已束手就擒，君侧已清，如果建文帝不死，燕王怎好光明正大地继承皇位？同时，成祖即位，自知人心不服，况且朝廷内外大臣多为建文帝的旧属，如果建文在世，诸臣就难忠于新君，而一旦建文起事，其号召力也是可以想见的。因此建文帝的去向，可以说是当时令燕王最头痛、最关心的事。终永乐一朝，对建文帝踪迹的寻觅，始终是第一等的大事。当时传说，建文皇帝在“靖难师”入城时，就削发被缢，从间道走出，云游四方去了。永乐帝多次命礼部榜示天下，申明僧侣、道人应严守清规，违者必诛。可见对僧、道行迹和事务的关注。

溥洽，字南洲，号一雨，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原姓陆，宋代诗人陆放翁之后，出家于普济寺。洪武十八年，住苏洲北禅寺，曾为建文帝主录僧。当成祖急索建文帝下落之明，有人告发说，建文帝被藏匿在溥洽的住所。朝廷命人对普济寺大加搜索，没有结果。最后，成祖又以它事为借口，拘捕溥洽。接着，又命给事中胡濙等以访异人为名，遍历山林、村野、佛寺、道观，实际上是察访建文帝。大约姚广孝在此时参与了拘捕溥洽的冤狱。不然，一个论功以为第一的人，为何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要为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说情呢？

成祖听了姚广孝的请求后，当即回答说：“朕答应你的请求，立刻命令放出溥洽。”于是姚广孝伏地顿首谢恩。自己制造的冤案，终于又由自己了结了。

过了几天，姚广孝即敛衽端坐而逝。成祖得到讣告，为之辍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京郊房山县东北，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赐谥号曰“恭靖”，并加赠少师。明成祖还亲自为他撰写神道碑以记其功。

姚广孝好学工诗，著有《独庵集》，后人合刻其诗文称《逃虚子集》，晚年著有《道余录》，专诋程朱。他还曾注释过《金刚经》。